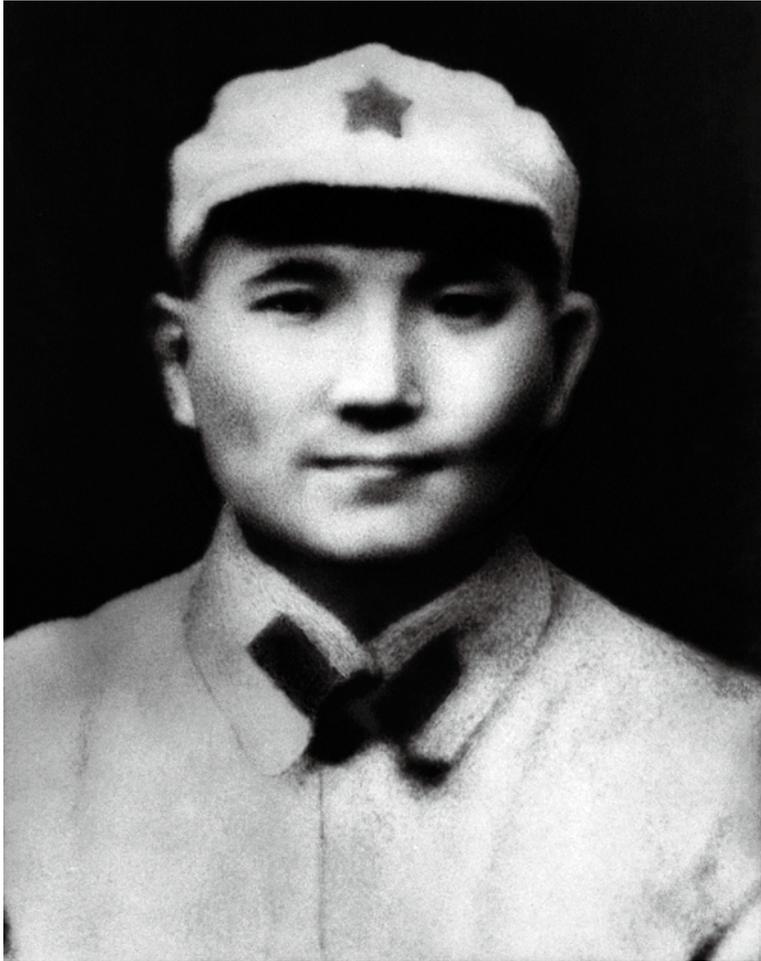




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的留影（1921年）



紅軍時期最早的留影（1935年）

目錄

第一章	走出廣安	19
第二章	從勤工儉學生到職業革命者	43
第三章	在黨中央機關工作	86
第四章	領導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	120
第五章	率紅七軍轉戰	164
第六章	在中央蘇區	190
第七章	在長征和東征、西征中	224
第八章	赴抗戰前綫	257
第九章	任一二九師政治委員	286
第十章	東進冀南	313
第十一章	在反磨擦鬥爭中	349
第十二章	百團大戰前後	379

第一章 走出廣安

鄧小平，原名鄧先聖，後曾改名鄧希賢。一九〇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清光緒三十年七月十二日）出生在四川省廣安州望溪鄉姚坪里（今廣安市廣安區協興鎮牌坊村）一個小地主家庭。

廣安位於四川省的東部，春秋時期屬巴國，是巴文化發源地之一。宋開寶二年，在渠江縣境秀屏山（亦稱翠屏山、銀頂山）下的濃洄鎮置軍，取“廣土安輯”之意，命名為廣安軍，隸屬夔州路。“廣安”地名由此而來。元代設廣安府，明清兩代設廣安州，一九一三年改設廣安縣。

廣安，西距成都二百公里，南距重慶一百餘公里。這裡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是川東北主要的糧食產地，“所產之稻米包穀香尤滋潤，號稱金羹玉版”^{【1】}，故有“金廣安”之稱。當地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金廣安，黃白瑩瑩然，桑麻榆棗豐，沃野無閒田。金廣安，庶民百姓，忠介質樸，不畏水旱，抗拒兇頑，名冠天府，點染好家園。”

鄧小平的家在廣安縣城北面約七公里處。這是一座有著典型川東北民居風格的農家三合院，坐東朝西，當地人稱“鄧家老院子”。房子為木穿斗結構，青瓦粉壁，共有十七間，歷經鄧小平曾祖父、祖父和父親三代才蓋成這樣的規模。

鄧氏家族在廣安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洪武年間。據《廣安州新誌》

【1】清末編寫的《廣安縣誌》。

記載：“鄧氏舊誌，其先本江西廬陵人。明洪武中有鶴軒者以薦舉南京兵部員外入川，遂籍廣安州北姚平家焉。”“其祖墓均在姚平，有宗祠。”

鄧氏家族在廣安世代繁衍，鄧小平是第十九代。

鄧小平的祖父鄧克達，勤勞、儉樸。祖母戴氏會紡紗織布。傳到鄧小平父親手上時，有一百二十挑穀地。後來，他的父親又新置了一些地，到鄧小平出生時，已是一個擁有二三百挑穀地的小地主了。

鄧小平的父親鄧紹昌，字文明，生於一八八六年，出生時父母都已年過四十。鄧紹昌十二歲時，父親病逝，母親獨自挑起持家的擔子。她雖然是一位農村婦女，但頗有見識，省吃儉用，想方設法讓兒子念書，甚至不怕花錢把兒子送到成都就讀，期望兒子日後能獲得功名光耀門庭。但是，由於時局動盪不安，鄧紹昌在成都法政學校只念了一年多時間，便回到老家務農。

鄧紹昌先後娶過四個妻子。第一個妻子張氏，婚後不到兩年就去世了。第二個妻子淡氏，生三子二女，長女鄧先烈，長子鄧先聖即鄧小平，次子鄧先修即鄧墾，三子鄧先治即鄧蜀平，次女鄧先珍（十歲時病死）。淡氏於一九二六年病故。第三個妻子蕭氏，生子鄧先清。第四個妻子夏伯根，是嘉陵江上船工的女兒。前夫病死後，她帶著一個女兒鄧先芙改嫁鄧紹昌，生了兩個女兒。大女兒鄧先蓉（十多歲時病死），小女兒鄧先群。一九四九年鄧小平和劉伯承率軍解放重慶後，鄧小平把夏伯根從廣安老家接到重慶同住。她從此和鄧小平一家生活在一起，直到二〇〇一年去世。

鄧紹昌有一些文化，特別是在成都接受過一些新式教育，見過世面，加之為人豁達、講義氣，經常參與一些“場面上的事”，在當地算得上一個小有名氣和影響的人。早年，他曾參加當地民間幫會組織——“哥老會”（在四川又叫“袍哥會”），在協興場的“袍哥會”中先後當過“三爺”、“掌旗大爺”（即頭領）。辛亥革命時期，他率眾參加過廣安的武裝起義。

一九一四年，他當上廣安縣團練局長、八縣聯防副指揮。他當官的時候，家境是殷實的，除了他掙來的錢“可以補助家庭的需用”外，“還有每年幾十石租及幾萬株桑的收入”^{【1】}。軍閥混戰時期，政局多變，當官就像走馬燈似的，鄧紹昌任職不到一年半的時間，他得罪過的一些人在廣安當政後他就被撤換了。他在家鄉待不住了，“逃難在外約七八年之久”，很少回家，“家庭的經濟亦隨之而逐漸破產”^{【2】}。一九三六年，鄧紹昌客死他鄉，不滿五十歲。家裡人為他在離鄧家老院子不遠的地方買了一塊墓地安葬。

鄧紹昌對孩子們很嚴厲，甚至有點苛刻，動輒打罵，孩子們都很怕他。但他有膽有識，有維新思想。他對孩子們寄予很大的希望，為了能供兒子讀書，不惜賣掉田地。他力主把鄧小平送到國外留學，希望兒子能有大的出息。鄧小平在法國參加革命活動後生活窘迫，他賣穀子、賣地寄錢接濟。鄧小平寄回來的一些宣傳革命的書刊，他也幫著收藏。

多少年後，鄧小平在談到父親時說了四個字“進步黨人”。他的弟弟鄧墾是這樣評價父親的：“他屬舊社會的人，有舊社會的一些壞東西、壞作風。但他對舊社會不滿，對我們兄弟倆參加革命，一直採取支持、擁護的態度，從來沒有反對過。”^{【3】}

鄧小平的母親淡氏，是廣安望溪鄉淡家壩人。淡家在當地也算得上是個富裕人家。一九〇一年，鄧紹昌和淡氏結婚時，淡家的陪嫁不薄。今天在鄧小平故居陳放的一張雕龍刻鳳的大木床，就是當年淡氏的陪嫁之一。淡氏在家中居長，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最小的弟弟淡以興與鄧小平

【1】鄧小平 1926 年 1 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撰寫的自傳。

【2】鄧小平 1926 年 1 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撰寫的自傳。

【3】訪問鄧墾的談話記錄，1994 年 5 月。

同歲，兒時和鄧小平一起念過書。解放後，鄧小平的家人對他常有接濟。一九八六年一月鄧小平在成都還和他見過面。

淡氏雖然沒有念過書，但賢惠通達，勤勞能幹。嫁到鄧家後，她照顧年邁的婆婆，哺育幼小的子女，把家中的一切都安排得有條不紊，成為遠近聞名的賢妻良母。鄧紹昌和淡氏結婚後，經常在外，對家裡的事不太關心，裡裡外外、大事小事主要靠淡氏。淡氏操持著將一些田地佃給缺地的農民耕種，還承擔了織布、養蠶、餵豬等家庭生產勞動和洗衣做飯等家務。她同鄰里和佃戶都處得非常好。鄉親們碰到甚麼難處向她求助時，她都是盡力相幫，在協興場一帶有很好的口碑。

淡氏特別愛孩子。每當鄧紹昌打罵孩子時，她總是出來為孩子說情，或請婆婆出來勸止。遇到兵荒馬亂的日子，她帶著孩子們東躲西避。她口才很好，能言善辯，喜歡擺“龍門陣”，總能把一件事說得有聲有色，把一些道理說得有根有據。鄧小平和姐姐弟妹們從小就愛聽母親講故事，從母親講的故事裡學到了不少的東西。

淡氏對鄧小平寄予很大的希望。鄧小平後來回憶說：“父母之愛我猶如寶貝一般。因為我自幼時資質就頗聰明，他們的愛我，自然是對我有很大希望，希望我將來能夠做官發財，光耀門庭”。^{【1】}鄧壘後來也回憶說：“我母親也非常愛小平，他是長子。當時因為我們家裡困難很多，父親長期不在家，當時維持這個家庭是困難的。她就是希望小平長大了以後，來管理家事。”^{【2】}

一九二四年，淡氏接到鄧小平從法國寫來的信，知道兒子不能回家也不能照顧家了。她很失望，兩年後病逝。家人們在她的墓前立了一塊碑，

【1】鄧小平 1926 年 1 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撰寫的自傳。

【2】訪問鄧壘的談話記錄，1994 年 5 月。

碑上刻寫的子嗣的名字，領頭的就是她生前夢魂牽掛的大兒子鄧小平。

鄧小平敬重、感激、懷念母親。晚年，他回憶說，當時那個家能夠保持生活下去，全靠母親。

鄧小平一歲的時候，父親按照當地的習俗，給他和一個姓唐的地主人家的女孩定下了一門娃娃親。父母企盼著他能夠早些長大成家，早些為鄧家傳續香火。就是這門親事，後來曾引起他和父親之間的激烈衝突。

一九〇九年農曆正月十五剛過不久，五歲的鄧小平被送到設在本村的私塾發蒙念書。

私塾離鄧小平家不遠，當地人稱為“翰林院子”。這個院子是鄧小平同族先輩鄧時敏修建的。鄧時敏雍正十年中舉，乾隆元年進士及第，進入翰林院被授以編修，後升為侍講，乾隆十年升大理寺正卿。清嘉慶年



鄧家老院子。鄧小平出生在這裡，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的大部分時光在這裡度過。

間朝廷為褒獎他和另一位廣安籍高官鄭人慶的功績，在村中敕建了兩塊神道碑和一座牌坊，“牌坊村”的名字由此而來。

“翰林院子”是一個有三十六間房的大四合院。院子中有一個小天井，還有一個戲台。鄧時敏曾把這個院子的一部分闢為學館。他去世後，由於家道敗落，院子賣給了外姓人家，但學館還是保留下來了，後人辦學不輟。

私塾先生與鄧小平的父親同輩，叫鄧紹明，是一個守舊的人。鄧小平入塾的當天，他就對鄧紹昌說，孩子名叫“先聖”，對孔老夫子有些不恭。他自作主張將“先聖”改為“希賢”，鄧紹昌也認可了。“鄧希賢”這個名字一直用到一九二七年。

私塾教學生就是讀課文和寫字。

讀課文，主要是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初級啟蒙課文。鄧小平理解能力強，記憶力好，一篇課文很快就能背誦和解答，常常受到先生的誇獎。

練寫毛筆字是每天的必修課。開始時是塾師把寫好的樣字發給學生，學生用紙蒙著描。有了一定的基礎後，學生就可臨著寫。鄧小平學寫字很認真，回家後也反覆練習。他的毛筆字作業常常被先生畫上大紅圈圈，也常常因此得到母親獎勵的煮雞蛋。經過私塾寫字課的嚴格訓練，鄧小平的書法有很好的功底。

鄧小平在私塾裡和同學們相處得很好。他不僅自己學習刻苦認真，還樂於幫助同學。同學胡德銀毛筆字總是寫得不好，老捱先生批評。鄧小平常常在放學後留下來，和胡德銀一起練字，幫助胡德銀糾正筆畫，掌握要領。胡德銀因此和鄧小平成了好夥伴。幾十年後，他還念念不忘兒時鄧小平對他的幫助。

鄧小平在私塾念了一年多後，父親決定把他送到在協興場開辦的初等

小學讀書。

協興場離鄧小平家大約有近兩公里。這是一個有近百戶人家的圩場，有一條直街，街面用青石板鋪成，街兩旁是一些小店鋪。農曆每月逢二、五、八趕場日，四周各村的老百姓來這裡趕圩，很是熱鬧。

協興場的初等小學，是由當地曾留學日本的革命黨人胡光白和鄧小平的父親鄧紹昌等創辦起來的，屬於新式學堂。鄧紹昌和胡光白把學堂辦起來之後，四處動員孩子入學。後來和鄧小平一同赴法勤工儉學的胡倫就是鄧紹昌動員上學的。

學堂位於圩場的中心，是由一座舊祠堂改建而成的，有四大間校舍，可容納百十個學生。

鄧小平入學時學堂有三個班，他被分在二班。

學堂開設的課程有國文、算術、體操（即體育）、圖畫等。學堂剛辦起來，教學還不正規，教師也多是臨時找來的。鄧紹昌也在這裡教過課。

從私塾轉到新式學堂讀書，鄧小平很有興趣。學堂的教學內容比私塾確實豐富多了。老師大多是當時協興場一帶公認的新文化人，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從他們那裡不僅能學到新知識，還能經常了解到一些新鮮事情。體操、圖畫課特別有趣。國文課也不再是從早到晚枯燥乏味的誦讀。老師從四書、五經中選擇一些課文給學生們講授，有時還撇開書本，給學生們講一些來自野史和小說裡的故事。國文教師鄧俊德，是鄧小平的遠房堂叔，排行第三，當地人稱鄧三先生。他是一位極富正義感的明白人，對於清廷的腐敗和社會的黑暗憤憤不平。他在講國文課時，常常給學生們講起歷史上的一些民族英雄，講一些反清的道理，還講到西方列強是如何侵略中國的。這些都給童年的鄧小平留下了深深的記憶。

鄧小平每天走著彎彎曲曲、高低不平的小路去上學。一遇雨天，泥濘不堪，一不小心就會滑倒。開始的時候，祖母和母親心疼他，怕他摔

目錄

第十三章 扭轉根據地困難局面（上）	7
第十四章 扭轉根據地困難局面（下）	36
第十五章 溫村會議與根據地的恢復和發展	72
第十六章 主持北方局工作	102
第十七章 反擊國民黨軍的進攻	144
第十八章 千里躍進大別山	178
第十九章 堅持大別山的鬥爭	205
第二十章 逐鹿中原	236
第二十一章 淮海戰役總前委書記	263
第二十二章 指揮渡江戰役	290
第二十三章 解放大西南	319
第二十四章 主政大西南（上）	369
第二十五章 主政大西南（下）	407

第十三章 扭轉根據地困難局面（上）

一九四一年是全國抗戰的第五個年頭，敵後抗戰進入嚴重困難的時期。一月一日，鄧小平在《新華日報》（華北版）發表《勝利的回顧與勝利的期待》一文。這篇文章，同他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表在《黨的生活》上的《迎接一九四一年》可以說是姊妹篇，也是回顧一九四〇年的工作，展望一九四一年的工作。不同的是，這篇文章基本上是從整個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形勢來看問題和談問題。

對於新的一年，鄧小平更多的是對形勢嚴重性和鬥爭艱巨性的清醒估計。他在文中說：

“一九四一年的鬥爭，無疑地比一九四〇年還要艱苦，還要殘酷”，“我們亦必須進行更堅強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鬥爭，去擊破敵人的‘囚籠政策’和各方面的進攻，擴大抗戰區，縮小敵佔區，取得比一九四〇年還要偉大的勝利。”“新的困難與新的勝利擺在我們的面前。新的困難，需要我們加強工作去克服；新的勝利，還有待於我們去爭取。”“迎接一九四一年，一幅嚴重鬥爭的場面展開了。”^{【1】}

“嚴重鬥爭的場面”比鄧小平預料的來得還快。

新年剛過，國民黨頑固派醞釀已久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達到頂峰。一月

【1】《鄧小平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43頁。

四日，在皖南的新四軍軍部及其所屬部隊九千多人，遵照國民黨軍事當局的命令，並經中共中央同意移師北上。一月六日，他們行經安徽涇縣茂林地區，突然遭到預先設伏的國民黨軍顧祝同部和上官雲相部七個師約八萬人的包圍襲擊。經七晝夜浴血奮戰，彈盡糧絕，除兩千餘人突出重圍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壯烈犧牲或被俘。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在蔣介石製造皖南事變之際，日軍乘機從一月下旬開始對華北抗日根據地大舉發動進攻。同月十六日，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制定的《對華長期作戰指導計劃（要點）》提出，“作戰目的是以維持治安、肅正佔領區為主”，決意在當年秋季以前，“竭盡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國際局勢變化，謀求‘中國事變’得到定局（第一期）”。^{【1】}

日軍在受到八路軍百團大戰重創後，越來越感到八路軍對它的威脅，因而對八路軍的進攻比以前更瘋狂、更殘酷。從年初開始，日軍沿著其控制的交通線的基本段，對抗日根據地實行“蠶食”政策，一面打擊其基本據點附近的抗日力量，一面派遣大批奸細、間諜潛入抗日根據地進行破壞。

晉冀豫抗日根據地是日軍摧殘、破壞的重點地區。一月中旬以後，日軍利用八路軍主力整訓之機，每次抽調四五百至千餘不等的兵力，對冀南各分區實施不間斷的反覆“掃蕩”。他們採取加強構築公路網、加築據點和封鎖溝、封鎖牆等措施，力圖割斷各根據地之間的交通，限制八路軍和抗日遊擊隊的機動，為其閃電“掃蕩”打基礎。他們捕捉青年壯丁，組織偽自衛團，以偽軍夾雜日軍或完全代替日軍守備據點，以便抽集日軍機動作戰。同時，還利用諸如青紅幫等一些封建幫會組織以及漢奸組織，在

【1】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天津市政協編譯組譯《華北治安戰》（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360頁。

抗日根據地內組織數人至數十人不等的武裝別動隊或組，暗殺抗日幹部，壓制群眾，離間軍民關係，掩護“掃蕩”的日軍。

晉冀豫根據地面臨著嚴重的困難局面。扭轉困難局面的唯一辦法，是加強根據地各方面的建設。

到這時為止，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已經有了三年多的歷史，在根據地的武裝建設和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等各方面都積累了經驗。與初創時期相比，根據地建設一個最大的進步和變化，就是加強了理論的指導。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文化》（後發表時改題為《新民主主義論》）的講話，系統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綱領，提出了建設新民主主義政治、新民主主義經濟、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目標和原則。各抗日根據地作為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實踐基地，按照建設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的目標和原則，努力推進各方面的建設，使根據地的建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鄧小平非常推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他在領導晉冀豫根據地各方面的建設中，身體力行地實踐這一理論，創造了公認的工作業績，也深得毛澤東的讚賞。

面對日軍的瘋狂進攻和國民黨頑固派的武裝反共，抗日根據地的武裝建設只能加強，不能有任何削弱。

一月二十日，鄧小平在一二九師組織工作會議上作關於目前局勢的報告指出：今天的反共高潮與投降危險有聯繫。反對投降依靠甚麼，一是力量，二是正確的政策。我們不能屈服，要加強我們自己。^[1]百團大戰後，晉冀豫根據地在補充主力兵團兵員時，忽視了地方遊擊隊必須保留的數額，

【1】鄧小平在一二九師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41年1月20日。

地方武裝力量有所削弱，從而影響到遊擊戰爭的廣泛開展。為此，劉伯承、鄧小平在領導一二九師主力兵團進行整訓、加緊恢復戰鬥力的同時，大力抓了地方武裝建設。

一月三十一日，鄧小平在太行區黨委和太行軍區聯合召開的第二次武裝幹部擴大會議上講話指出，對敵鬥爭應以武裝鬥爭為核心，軍區建設則是武裝鬥爭的中心環節。他說：

“如果說寇奸夾擊抗日軍民是以武裝鬥爭為核心的話，我們抗日軍民反對寇奸的夾擊也無疑地應以武裝鬥爭為核心。”

“所謂武裝建設，應該包括正規軍、地方武裝和民兵自衛隊等三方面的建設。這三種抗日武裝和半武裝的力量，在抗日鬥爭中是缺一不可的，而將三種武裝與半武裝力量結合為一個整體，以進行勝利的武裝鬥爭，則是軍區的責任。所以，軍區建設成為武裝建設的中心一環。”“忽視了武裝建設，就無法應付寇奸夾擊的局面，就無法戰勝日本強盜；忽視了軍區建設，就沒有堅強的武裝建設，更沒有堅強的勝利的武裝鬥爭。”“軍區擔任了積蓄武力與使用武力的責任，擔任了把勞動力與戰鬥力結合起來的責任，擔任了把正規軍、遊擊隊和民兵自衛隊結合起來，開展全面的武裝鬥爭的責任。”^{【1】}

進入一九四一年以後，晉冀豫根據地的政權建設邁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一是普遍進行村選，產生了村政權；二是選舉邊區參議會議員，召開臨時參議會，正式建立了邊區政府。

村政權建設是整個政權建設的基礎。早在一九四〇年八月冀太聯辦成立後不久，各地即按照聯辦頒佈的《施政綱領》提出的“徹底實現民主政

【1】《鄧小平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48、149頁。

治，建立廉潔政府”的目標，在聯辦的統一領導下，進行了改造支部和農會的工作，為即將開始的普遍的村選做準備。年底，晉冀豫區召開第一次專員、縣長會議，重點研究和討論政權建設問題特別是農村基層政權的建設問題，確定一九四一年把進行村選作為重點工作任務之一。村選原計劃從一九四一年一月開始，由於皖南事變和日軍“掃蕩”的影響，推遲到四五月間進行。各地經過宣傳、教育、發動、選舉等幾個步驟，普遍產生出村政委員會和村長，為隨後舉行的縣選和邊區大選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二月，北方局開會討論成立邊區政府問題，決定由鄧小平代表北方局向冀太聯辦提出召開臨時參議會正式成立晉冀豫邊區政府的建議。

三月十六日至四月五日，冀太聯辦召開第二次行政會議。會議開幕的當天，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致電會議，提議成立晉冀豫邊區臨時參議會。電報指出成立邊區臨時參議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抗日根據地的建設與鞏固，其中心環節，厥為民主政治之樹立與發揮，以及三三制^[1]的抗日民主政權之認真建設。”“建立統一的有權力的晉冀豫邊區參議會實為刻不容緩。”電報中指出：“晉冀豫邊區參議會必須由人民直接選舉議員組成，不應絲毫草率，致傷民主政治之真實意義。”電報中提出“希望邊區臨時參議會之組織成份，能切合三三制之原則，能真正代表各黨各派各階層之意見”。^[2]

三月十八日，會議決定接受鄧小平代表北方局的提議，邀請黨政軍民各界組成邊區臨時參議會籌委會，在管轄範圍內進行推選參議員的工作，

[1] 三三制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統一戰綫政權政策。根據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權中人員的分配，共產黨員大體佔三分之一，左派進步分子大體佔三分之一，中間分子和其他分子大體佔三分之一。

[2] 《鄧小平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69、170頁。

並準備召開臨時參議會。

四月五日，鄧小平又代表北方局致電會議，提出對晉冀豫邊區目前建設的十五項主張，作為召開臨時參議會的指導綱領。十五項主張的基本內容是：

堅持華北抗戰，誓死與晉冀豫邊區人民共存亡；與一切抗日黨派親密合作，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到底；為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而奮鬥；加強與擴大武裝力量，實行全民武裝自衛；加緊民主政治建設，逐步實現民選各級政府；堅決鎮壓死心塌地的漢奸，貫徹保障人權；確切保障一切抗日人民之財產所有權；調節勞資雙方利益，增加工業生產；加強農村階級團結，增加農業生產；逐漸建立統一的財政制度，實行統一的所得累進稅；對敵實行統制貿易，根據地內實行自由貿易；加強文化教育運動，提高民眾文化政治水平；保障女權，實行男女平等；面向敵佔區，縮小敵佔區；邊區內所有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上一律享有平等自由權利。^{【1】}

同日，成立以楊秀峰任主任委員的臨時參議會籌備委員會，正式開始臨時參議會的籌備工作。選舉參議員的工作隨即展開。

到六月，各地的抗日黨派、職業團體、軍隊等都順利地推選出邊區參議員。鄧小平被一二九師推選為參議員。六月二十七日，他代表北方局提出將魯西區歸入冀太聯辦管轄。晉冀豫臨時參議會籌委會和冀太聯辦第三次行政會議接受這一提議，並決定將晉冀豫邊區臨時參議會籌備委員會改名為晉冀魯豫邊區臨時參議會籌備委員會。

這樣，晉冀豫邊區便擴大為晉冀魯豫邊區。

【1】中國共產黨歷史資料叢書《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戰爭時期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版，第 316—320 頁。

七月七日至八月十五日，晉冀魯豫邊區臨時參議會在遼縣桐峪鎮隆重舉行。鄧小平作為共產黨參議員的首席代表參加會議。會議根據三三制的原則選出了晉冀魯豫邊區臨時參議會議長和副議長。同時成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轄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行政區。在軍事上，冀魯豫軍區歸八路軍總部領導，一二九師兼太行軍區，下轄太岳、冀南軍區。會議選舉楊秀峰為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勝為副主席。鄧小平被選為臨時參議會駐會委員，參加臨時參議會的領導工作。

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的建立具有重要意義。鄧小平當時說：

“這不僅是在形式上把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各個抗日根據地緊密地聯繫起來，而且也是幾年敵後抗戰的成績和根據地各種建設的成績的具體表現。”^[1]

抗日民主政權的政權結構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機關。邊區（省）、縣的參議會既是民意機關，也是最高權力機關。臨時參議會召開之前，鄧小平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以他在四月五日代表北方局提出的《對晉冀魯邊區目前建設的十五項主張》為基礎，領導制定《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施政綱領》（以下簡稱《施政綱領》）；同時，還領導制定以下七部重要法規條例，即：《晉冀魯豫臨時參議會暫行組織條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組織條例》《晉冀魯豫邊區土地使用暫行條例》《晉冀魯豫邊區統一累進稅條例》《晉冀魯豫邊區勞動保護條例》《晉冀魯豫邊區軍事支差條例》和《晉冀魯豫邊區婚姻條例》。臨時參議會上，鄧小平組織對《施政綱領》進行了充分的討論，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施政綱領》在會上基本通過。會後，鄧小平組織臨時參議會駐會委員和邊區政府委員又對《施政綱領》

[1] 《鄧小平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248頁。

逐條進行了修改。九月一日，《施政綱領》正式公佈實施。薄一波後來回憶說：

“會議根據小平同志四月五日代表北方局提出的《對晉冀魯豫邊區目前建設的十五項主張》，制定了《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施政綱領》，會後正式頒佈施行。據此，各地普遍進行了村選舉，各縣政府都基本上實行了‘三三制’。邊區空前統一，抗日民主政權更加鞏固。由於實行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晉冀魯豫邊區建設呈現一派朝氣蓬勃的景象，為後來發展成為全國十九塊根據地中最大的一塊奠定了基礎。”^{【1】}

晉冀魯豫邊區臨時參議會開會期間，延安《解放日報》專門發表題為《敵後民主政治的偉大貢獻》的社論。社論指出：“晉冀魯豫邊區，包含有太北、太岳、太南、冀南、冀魯豫五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區域，如果再加上魯西（最近已劃入晉冀豫），則其所轄地區，東自津浦，西臨汾河，南起蘇魯，北迄冀晉，幅員之大，人口之多，在華北各抗日根據地中，堪稱第一。”“晉冀豫區的成績，已使根據地具備了新民主主義的雛形，繼晉察冀之後，逐步地走向模範抗日根據地。”^{【2】}

在根據地內實行三三制民主建政，關鍵在於中國共產黨帶頭實行民主。當時，由於全國抗戰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地位和影響迅速提高及其他各種原因，根據地黨內普遍存在著以黨代政的傾向和“黨權高於一切”、“黨員高於一切”的錯誤觀念。鄧小平敏銳地看到了這個嚴重影響抗日民主政權建設的問題，在籌備召開臨時參議會的工作剛剛開始時，於四月十五日在《黨的生活》上發表了《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一文。

【1】薄一波《大家風範 舉重若輕——憶小平同志在太行》，《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解放日報》1941年7月14日。

目錄

第二十六章	初到中央工作（上）	7
第二十七章	初到中央工作（下）	38
第二十八章	籌備中共八大	68
第二十九章	一九五七年的整風反右	100
第三十章	面對“大躍進”興起	141
第三十一章	堅持糾“左”	176
第三十二章	克服嚴重經濟困難（上）	228
第三十三章	克服嚴重經濟困難（下）	277
第三十四章	在中蘇論戰中	312
第三十五章	繼續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343
第三十六章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381
第三十七章	在江西的日子	421
第三十八章	復出	458
後記		492

第二十六章 初到中央工作（上）

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朱德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任命鄧小平為政務院副總理。

到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只用了三年時間就實現了預期的目標，為進行有計劃的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創造了條件。按照“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構想，中共中央決定一九五三年開始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加強中央的領導力量和中央領導機構，中共中央決定抽調各中央局主要負責人到中央工作。在鄧小平調任政務院副總理的同時或稍後，主持西北局、西北軍政委員會工作的習仲勳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主持中南局、中南軍政委員會工作的鄧子恢調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調任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一時有“五馬進京”之說。

鄧小平的任職，六七月間就已定下來。周恩來考慮他和陳雲八月中旬將出訪蘇聯，政務院迫切需要得力的人主持工作，於七月十日寫信給毛澤東、劉少奇等人，提議先發表鄧小平為政務院副總理，再請他八月份起來京主持政務院的日常工作。^[1]三天後，劉少奇為中央起草給鄧小平的電

[1] 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雲等的信，1952年7月10日。

報提出，希望鄧小平將西南工作佈置後即來中央。

鄧小平是七月下旬到北京的。初到北京，他一家臨時住在北京飯店。很快，中央辦公廳準備把東交民巷十七號院的一棟小樓分配給他。鄧小平的三女兒毛毛後來回憶：“有一次，父親去看羅榮桓元帥。羅帥的身體很不好，看到羅帥住的房子有些潮濕，父親當時就對羅帥說：‘你住在這裡不行。中央給我分了一處住房，我讓給你去住。’在父親的親自安排下，羅帥住進了東交民巷的房子。”^{【1】}

在鄧小平帶著全家離開重慶坐飛機飛北京時，他的二女兒鄧楠想到在重慶別人都叫爸爸“首長”，便好奇地問爸爸到北京後是甚麼“長”？鄧小平回答是“腳掌”。^{【2】}首長變成“腳掌”，這雖是跟孩子們講的玩笑話，卻道出了鄧小平的內心，他注重做事，而不講求職位、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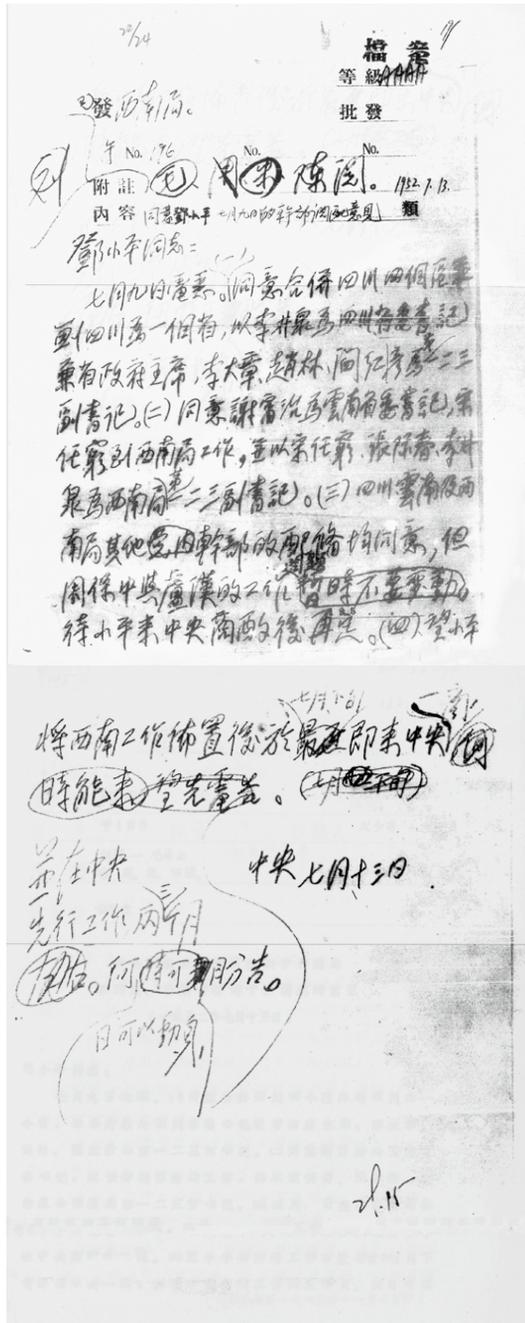
八月十五日至九月二十四日，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為了便於鄧小平在政務院和中央人民政府開展工作，行前的八月十日，他以政務院黨組幹事會書記名義向毛澤東並中共中央書記處書面報告，提出改組、擴大原政務院黨組，並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以周恩來任政府黨組書記，陳雲、鄧小平分任第一、第二副書記。八月十三日，毛澤東批示同意。同日，鄧小平正式上任，主持召開政務院第一百四十八次會議。會上，周恩來宣佈：在我奉毛澤東主席之命赴蘇聯訪問期間，由鄧小平代理總理職務。^{【3】}

一段時間內，鄧小平經常性的工作是代中共中央起草、修改給各地、各部門的文電、指示，處理政務院日常事務。這些文電、指示大部分由

【1】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420頁。

【2】《永遠的小平：卓琳等人訪談錄》，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96—97頁。

【3】周恩來在政務院第148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2年8月13日。



劉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給鄧小平的電報中說：“望小平將西南工作佈置後於七月下旬即來中央一商，並在中央先行工作兩三個月，何日可以動身，盼告。”

毛澤東、劉少奇，或毛澤東、周恩來，或毛澤東、周恩來、陳雲，或劉少奇，或周恩來審閱簽發。一九五三年三月，毛澤東指定：“凡政府方面要經中央批准的事件，請小平多管一些。”^{【1】}

從一九五〇年下半年以來，公營和私營商業整體上日趨活躍。但是，較之於私營商業，國營和合作社商業發展過快，貿易比重也擴大過多。加上，城市“五反”運動開展後，私營商業受到衝擊，更拉大了其與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發展上的差距。以華東地區為例，一九五二年一至六月商品流轉總額與上一年同期相比較，國營商業增長百分之七十五，合作社商業增長三倍，而私營商業則減少百分之四十二。當時，全國私營商業（包括坐商和攤販）有七八百萬戶，大城市中有十多萬私營批發商，整個私營商業從業人員達數千萬。如果不解決存在的問題，勢必會增加失業，影響市場、城鄉交流和社會穩定。

為此，中共中央決定發出《關於調整商業的指示》，擬採取適當劃分公私商業的經營範圍，縮減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的零售業務，擴大批零差價，取消各地對私商的不適當限制等主要措施。

十一月十四日，鄧小平對《指示》稿進行修改，加寫了八百七十多個字，明確指出商業發展中存在盲目冒進的傾向，並分析了其產生的原因，闡述了商業調整的重要意義。其中說：

“我們在商業工作中，若干地方存在著盲目冒進的傾向，這是由於有些同志在‘三反’、‘五反’之後，只看到資產階級壞的一面，不了解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仍然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力量，不了解我黨團結資產階級是一個長期的政策，尤其不了解經營商業的還有為數很大的小商小販，而依

【1】毛澤東在審閱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同意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 1953 年上半年工作要點》覆文稿時的批示，1953 年 3 月 3 日。

賴私營工商業謀求生活的人更以千萬計。如果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採取粗暴的政策，不但不能充分利用私人資本利於國計民生的一面，使之服務於國家經濟建設，而且勢必打擊到廣大的小商小販，並使成千成萬依靠私營工商業謀生的人喪失生活來源”，“我們現在又必須克服當前存在著的在商業工作中的‘左’的傾向，才能使我們即將開始的五年經濟建設計劃得以順利地實施。所以，立即對於公私商業的關係進行一次調整，是非常必要的。”^{【1】}

《指示》經毛澤東審定後於十一月十五日下發，中共中央在下發《指示》的通知中強調，“這個指示除刊登黨刊外，應即印發至縣委及有關各黨組。縣以上的各級黨委及黨組在接到這個指示之後，應立即進行專門的研究，擬出實行的辦法，並召集縣以上的國營商店和合作社工作的黨員幹部會議，進行傳達和討論。”^{【2】}

直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大區黨政機構撤銷，鄧小平一直還兼任著西南局第一書記的職務。因此，他有時還回重慶主持西南局的一些重要會議，處理一些重要工作。

半個多月後，鄧小平在重慶西南局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上特別指出，商業調整不只是商業部門的責任，更主要的是各地黨委部門的責任。結合西南地區的情況，他再次強調了調整商業的重要意義。他說：

“商業問題主要是冒進及‘左’的傾向”。“私營商業的發展不可怕，主要是怕冒險‘左’，因商業不僅是資本家的問題，而是影響到不下於三千萬人的生活問題。”“問題的本質在這裡，是社會問題。在五年之內，私營經濟還要略略增加，但增加比例還是國營增加大。因此，冒進要糾正，

【1】鄧小平在審改《中共中央關於調整商業的指示》稿時加寫的話，1952年11月14日。

【2】《中共中央印發關於調整商業的指示的通知》，1952年11月15日。

商業要調整。”^{【1】}

《指示》下發後，全國大部分地區都進行了商業調整。各地私營商業紛紛增加資本、擴大經營，很快呈現出發展的勢頭。

一九五二年秋冬，為了適應國家經濟建設大規模展開的需要，對省、區建制和大行政區機構與任務作了較大的調整。調整省、區建制的一條原則是恢復舊省制。其中，合併川東、川南、川西、川北四個區恢復四川省，建立四川省人民政府，是鄧小平進京之前主持完成的。他和賀龍等研究提出，以李井泉為四川省委書記兼省政府主席，李大章、趙林、閻紅彥分別為第一、二、三副書記。七月十三日，劉少奇代中共中央起草給鄧小平的電報批覆同意這一安排。^{【2】}

大行政區政府或軍政委員會，是在新中國初建時設置的。這種組織形式在當時中央和地方新政權剛剛建立、各地區工作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下是完全必要的。但到了這個時候，為了統籌全國的經濟文化建設，就需要加強中央的統一和集中領導。因此，調整大行政區機構勢在必行。調整的措施是：將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委員會或軍政委員會，改為行政委員會，僅作為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各地區進行領導與監督地方政府的機關，不再作為地方最高政權機構。

十二月七日，鄧小平在重慶主持召開西南局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傳達中央關於調整大行政區機構問題和籌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問題等的指示精神。關於調整大行政區機構問題，他指出：國家組織形式必須適應計劃經濟，“過去國家政權共七級，層次太多，障礙領導”，調整後“仍

【1】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記錄，1952年12月7日。

【2】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同意西南局《關於成立四川省及西南人事調整問題意見》的電報，1952年7月13日。

是七級，但是‘四實三虛’^{【1】}。”經濟恢復時期，“大區的權力很大，便於因地制宜”。但現在“搞建設必須集中”。縮大大區行政機構，並將其由“實”變“虛”，節約出來的幹部往哪裡擺？鄧小平在會上提出，“節約出來的幹部分配到廠礦去”。他認為市一級要加強，中央局可以不直接管廠礦，而市委必須管；加強廠礦幹部，這就叫加強工業。^{【2】}

鄧小平在重慶期間，發現中央有關部門有趁調整大區機構向下邊大批調幹部的情況。例如，輕工業部派人到重慶西南輕工業局，除持有組織部門文件調局長一人外，又額外調科、處長三十人，一般幹部一百人；糧食部通知糧食系統幹部不許往別的部門調動；財政部亦有此說。為此，他十二月九日致電陳雲、薄一波並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提出：“大區改組期間，幹部調整必須委託各中央局負責才有辦法，事實上各系統幹部要作若干必要的調劑，才能節約一些幹部送中央。特別需要從緊縮機關中給企業廠礦加強一批財務幹部及領導骨幹。中央各部需要補充幹部仍由中央組織部統籌調動為宜。”^{【3】}回京後不久，鄧小平又提出：“在此次調整大行政區組織中，還可以從大區公安部現有人員中節約一些幹部放到經濟保衛工作崗位上面去。”^{【4】}鄧小平的這些意見被中央採納，使調整大區機構後一大批幹部得到了合理使用。

鄧小平處理完西南的事情後，於十二月底回到北京。這時，由於有關部門在修正稅制問題上工作出現錯誤，引發了政府工作體制一次比較大的變動。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1】“四實”指中央、省、縣、鄉，“三虛”指大行政區、專區、區。

【2】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記錄，1952年12月7日。

【3】鄧小平致陳雲、薄一波並周恩來及中共中央的電報，1952年12月9日。

【4】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羅瑞卿並告各中央局、分局的電報，1953年1月5日。

一九五二年秋，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醞釀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為了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保證和增加稅收，財政部提出修正一九五〇年頒佈的《全國稅收實施要則》，並擬定了具體修正方案。中財委討論通過這個方案。十二月二十六日，政務院第一百六十四次政務會議批准了這個方案。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正式公佈《關於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稅試行辦法》。由於修正工作操之過急，新稅制未經中央討論，也未徵求地方財政、稅收部門的意見，就匆匆忙忙出台，結果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因為增加了國營企業的稅收負擔，取消了供銷合作社減免稅的優惠，一些私營批發商從中佔便宜，引發物價波動、搶購商品和思想混亂。新稅制的執行也遇到很多困難和問題。

這件事引起了毛澤東的強烈不滿。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他寫信給周恩來、鄧小平、陳雲、薄一波批評說：新稅制事，中央既未討論，對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達通知，匆卒發表，毫無準備。此事似已在全國引起波動。^[1]他把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向中央報告的問題看得很重，認為政府工作存在著分散主義。由此，提出了加強黨中央對政府各部門集中領導的問題。

二月十九日，周恩來召集鄧小平、李維漢、董必武、彭真、劉景範、薄一波、曾山、賈拓夫、安子文、習仲勳等開會，討論關於加強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及政府工作領導分工問題。會議提出：“根據政府工作直接受中央政治局領導的原則，今後政務院各委和不屬於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門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應直接向中央（政治局）請示報告。如係主席直接交辦的事項，應直接向主席請示報告。”會議決定：

【1】毛澤東關於新稅制問題致周恩來、鄧小平、陳雲、薄一波的信，1953年1月15日。